兩位老人

姚船

這裡說的兩位老人家，並非什麼名人，但在我的內心，卻是繫着情感深處最值得和懷念的長輩。她倆就是我的母親和姨媽。

外婆的七名子女中，姨媽最大，我母親是么女，相差近二十歲，儼然像母女般。姨媽和母親的朋友都說，她們兩人長相完全不同，性格迥異。以前我也這麼想，可不母親病重彌留之際，看着她恍似一下子變得枯瘦，皺紋肆意伸延的臉龐和神色黯然的，突然間發現這張臉和三十年前躺在病床上的姨媽極爲相似。而且，兩個人都走得很安詳。其實，母親和姨媽最相似之處，在於命運之神的遺棄，上半生道路坎坷不平，艱難困苦。外婆家在貧窮的鄉下，日子本就不好過，加之子女多，生活更加艱難。姨輕時嫁到城市，姨丈是廚師，本以爲從此走上脫貧之路，誰知表哥這個獨子還年少的，姨丈因中風導致癱瘓，在床上一躺就是十二年。姨媽既要做手工養家餬口，又要照人、撫養孩子，生活的重擔壓得她矮小瘦弱的身軀過早有點佝僂，滿臉皺紋，凡事逆受，苦水盡往肚裡吞。

而母親小時，外公外婆相繼去世。雖有兄嫂拉扯一把，但幼小心靈從未享受過歡十八歲時由姨媽作主，也嫁到城市來。起初生活尚算安定，生下我們姐弟兄妹三個孩原想苦盡甘來，殊不知天有不測風雲。一九四五年八月，父親乘坐抗戰勝利後從汕頭的第一艘輪船往香港做生意，不幸輪船半途失火沉沒，父親葬身大海，從此杳無音訊似晴天霹靂，當時母親才二十五歲，三個小孩小不更事，家中還有一個阿嬤，家庭重下子全落在她一人身上。母親抹掉眼淚，咬緊牙根，決心獨力把孩子成人。她外出打工，又靠親戚一點幫助，艱難過日子。實在捱不下去先帶我姐姐往香港謀生。不久，阿嬤去世。後來，妹妹也被接往香港戴着紅領巾的我，卻選擇留下在華僑學校住宿讀書。母親在車衣廠拚作。可以想像，那十幾年，她遭受的壓力、承受的痛苦有多大。

姨媽和母親像舊社會千千萬萬在苦難中掙扎的中國婦女一樣，磨更加堅強，只是兩人脾性卻幾乎完全相反。也許是環境使然，母親腰，一直到老年雙眼仍炯炯有神，說話大聲大氣。由於家人都在香港和，在國內工作的時候，我有空常到姨媽家去。那時她已生活無憂，姨沖一壺功夫茶閒話聊天。她從不說教，有時談到往事，卻有一句話常嘴上，似乎要我牢記心裡。她輕聲慨嘆：「俗話說，如吞三寸劍。所以不管碰到什麼事，我都不敢隨便向口。」姨媽去世隔年，我也來到加拿大。在最初幾年親一起生活中，我發現她的處事方式與姨媽截然不同奇怪的是，她也常常引用那句俗語來警誡我。當然，表達方式直截了當：「求人如吞三寸劍。手在自己身凡事不要靠別人，自己努力！」也許這是他們兩人在人生路上的切身體會和經驗。有言道，「富在深山有人尋，窮在路邊認。」正是說出這個道理。在人心叵測，笑貧不笑娼的社會，眞正肯沒錢缺糧的孤兒寡婦伸出援手的人少之又少。幸而弱者有堅強信念和不撓精神，可以在挫折和奮鬥中迎來生命中新的一頁。每每想起姨媽親的話，想起她們前半生艱苦的歷程，我心中自然萌生起一股努力向力量。

幸運的，姨媽和母親的後半生都能過着安定自在的生活，而且，並沒有把周圍的世界看得很黯淡，更無半點嫉惡如仇和報復的心態，珍惜在漫漫長路中人們曾經給予的那怕只是一絲的溫情和善意。她們常唸叨的另一句的話是：「渴時一點如甘露。要幫助有困難的人，那怕只是一點點。」記得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國內經濟生活困難，物資緊絀，姨母家因爲有「南風窗」（表兄在香港，供一些米、油等生活必需品的支援。）生活不很窘迫，但她自己仍節衣縮食，把積蓄的零用錢和少量物資，支援鄉下比較困難的親戚。

母親晚年住在加拿大政府提供的，讓能自理日常生活的老人居住的大廈，其開朗、樂於幫助病弱者的性格，得到同廈老人的讚賞。每每我們送去好吃的東西，她馬上跟其他人分享。倘知道某位老人的兒女或親戚是新移民，她都會主動送衣送物。碰到機構籌款，母親也會慷慨解囊。當她在電視中看到四川大地震的悲慘場面，頻頻搖頭，雖然身在病榻，無法外出，但還託人捐出一百元加幣，略表心意。整理母親遺物的，我們無意中看到有關機構寄來的捐款收據，敬重之情更難以言表。好幾位老人牽着的手說：「眞捨不得姚婆婆走！」我們做子女的，自然更體會這種心情。

我走過的人生路，差不多一半在國內，一半在海外。三十年東方，三十年西方。和姨媽親近，後段親近母親。我深深體會到她倆身上散發出來的中國式母親平凡而偉品格。不管她們身處何方，都能含辛茹苦，以驚人的意志披荊斬棘，犧牲自己，爲子創出一片新天地。而她們更以自己的慈愛，被及周圍的人。眞愛感人，大愛無疆。這中國母親傳統的智慧和美德。我懷念姨媽，懷念母親。而那些像她們一樣，爲後輩留貴精神遺產的海內外中國式母親們，都值得我永遠謳歌。

母親（版畫） 秦勝洲

看自己家的書

徐城北

想起來都有些可怕——家裡的書太多了！文壇前輩送給父母的簽名本（少數是他們簽名送給我與妻子的），這些擺在書架書櫃的最上層。稍下一些，是文壇朋友送給我與妻子的，再下，則是我們這幾十年自己的收藏。除了書，還有音像方面的資料，這對研究戲曲的人又特別重要。一些，是名家親自送的「孤本」，許多是戲曲史上的珍貴記錄；另一些，則是自己辛苦搜集來的，是準備用來搞研究的。在書架書櫃上，最上邊最華貴也最好看，越往下就越不能細看。但眞正有用的還在下邊。

最近單位體檢，結論一度非常「不好」。後來到大醫院複查，終於排除了那些「不好」。重新面對自己家的書，感慨就非常之大了。如果眞有那麼一天，我這輩子積攢下的這些書，不都得進紙漿廠麼？復又歎息：已經有二三十年，我就沒再進圖書館！但我又一直是坐在家裡寫作的。遇到要用書時，伸手向書櫃一拿，那書中是有記號（或折頁，或眉批）。如果還不稱心，打電話向資深朋友請教，或也能「超越難關」。在如今的北京，圖書館越來越大並愈來愈遠，我實在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啦。對此，我幾乎早就絕望。

直到最近，兩件事讓我改變了態度。第一，是我某次從北四環去南三環看望我們這個行業中的泰斗，他都九十一歲了，精神旺健，著述甚豐，還送了我一本他去年的新作。我不能不感佩，也不能不奮發。但我又發現一樁奇事：他家裡的書並不是很多。他看出我心中的疑竇，遂講出他「每十年清理一次藏書」的做法。他說，如今居住條件不差，但書房再大，也裝不下七八十年的積累。沒辦法，只能咬牙處置了：重新掂量其中各自的價值，如果對未來用處不大，再重要的也只有掃地出門……此老是與我父輩之人，他都能咬牙做這件事，我難道就不應該麼？於是，我下定決心也對自己的收藏進行清理。但與老先生不同的，則需要「減中有加」——一方面減時需要咬牙，但還需要增加一些對未來十年（暫定十年吧）還有用新的「經典」。也就是說，未來絕對應該坐在自己的家裡寫作，但把時間浪費在查閱資料之上，似乎不是成功者的辦法。

第二，我最近又跑過幾趟紫竹院附近的國家圖書館。我承認，路確實是遠，但近來交通又大大便捷了。我找到了乘坐公交車最便捷的路線，同時因我擁有了一張最高級的借書卡。此外，如今我可以在家中電腦上就查閱了圖書館有關的書目，進入後請他們幫忙，在半小時內就能拿到我要看的書。當然，我只是瀏覽一下，然後迅速決定哪些外借，哪些複印，哪些只是瀏覽一下其思路……在新時期中，「坐擁書城」這句話還是對的，但也有了一個先決條件，要不斷適時地自我更新。我對家中那些前輩留下的簽名本，究竟如何處理，還沒有想出一個定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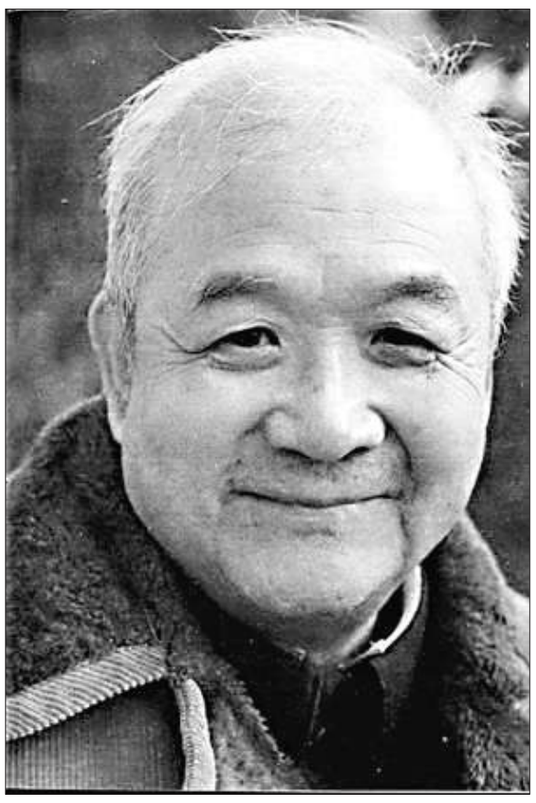
我大體迅速地贏得了主動，我還是讀自己家裡的書，然後力所能及寫一些還不算太落伍的東西。當然這當中的「坐」，是要建築在業已「完善過藏書」之後；但與此相輔相成的，是必須每隔一段時間再跑一跑圖書館，捕捉最新潮也最準確的信息。這和我目前的看病一樣，每隔兩三個月進城到三甲醫院診斷全身基本情況，然後平時就蹲在家裡，從社區的衛生院中拿藥。二者相輔相成，缺了哪一環也不成。做學問與保健的道理，其實也都是大體一樣的。

蕭乾與《人民日報》

文潔若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蕭乾擔任英文版《人民中國》副主編兼社會組組長。喬冠華是主編，但其大半個身子在外交部。一九五〇年九月初，原定讓蕭乾參加訪英代表團。團長爲劉寧一，蕭乾任秘書。周恩來總理還接見了全體成員。臨動身前被取消出訪資格。喬冠華對他說：「你還是在國內轉轉吧。」他感到可能是某段歷史未查清楚，就趕緊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自傳，交了上去。空白處，密密匝匝記下好幾十個證人的名字，那時這些人尚健在。一九九六年，嚴文井最後一次光臨舍下時告訴蕭乾，早在一九五六年他的歷史就審查清楚了。

全國範圍內的大規模土改是一九五一年初開始的。國際新聞局爲了對外報道，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就派蕭乾提前赴湖南，參加並採訪在那裡即將進行的試點工作，以便寫一批文章說明中國是怎樣消滅剝削制度的。


蕭　乾

當時《人民中國》是個周刊。蕭乾爲《人民中國》所寫的《土地回老家》是由《人民日報》的劉曉晞和林韋負責審查的。遇有疑問，由他們向有關方面請示。蕭乾相信，五十年代初期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范長江，及時讀到了自己的稿子。蕭乾和范長江結識於一九三五年。蕭乾是燕京大學畢業後，於九月入天津《大公報》編副刊的，范長江比他早去了幾個月，以《大公報》特約通訊員的名義，深入中國西北地區考察採訪。

《土地回老家》在《人民中國》上分五期連載畢，英、俄、印尼文的單行本就印了出來，統共被印成印、緬、日、德、法等十一種外文。范長江提出讓蕭乾也爲國內讀者寫點。他遂寫了篇《在土地改革中學習》，很快就在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的《人民日報》上顯著地刊登出來了，還受過毛澤東主席的表揚。

一九五五年，作家協會秘書長郭小川特意來看望蕭乾，問他對組織有什麼要求。他直率地談了自己想寫作的願望。不久，他就由譯文社調出，進入專業創作人員的行列。他急如星火地做了去開灤煤礦體驗生活三年的計劃，交了上去。然而，這份計劃被擱置下來，因爲反胡風運動打響了。

一九五六年七月一日，《人民日報》改版。建國前後相當長一段時間，胡喬木主管《人民日報》的工作。一天，胡喬木跟蕭乾面談讓他當《人民日報》文藝部八版顧問，也就是副刊顧問。蕭乾生怕這下子被拖住，夢寐以求的寫作計劃會泡湯，於是試圖婉謝。胡喬木厲聲說：究竟是組織上的決定重要，還是你的個人意願重要？蕭乾只好乖乖的就範。蕭乾畢竟是編《大公報》文藝副刊起家的，幹得很起勁兒。當年我們住在東總布胡同四十六號的作協宿舍裡。他每天上午騎着那輛一九四六年從英國帶回來的自行車，穿過兩條胡同就到了報社所在的王府井大街。那四層樓房是一九五四年竣工的。

文藝部的首席領導林淡秋指定姜德明跟着蕭乾去組稿，聯繫作者。姜德明住在貢院東街的四合院裡，相距不遠，他們二人直接從住處出發，先後拜訪過冰心、沈從文、李健吾、楊晦、何其芳、錢鍾書、楊絳、陳夢家、趙夢蕤、楊憲益、吳祖光、黃苗子、張友鸞、金克木、鄧廣銘等。楊晦自一九五〇年起任北大中國語言文學系主任。校園的綺麗風光使蕭乾想起當年三月七日去世的楊振聲教授。楊先生曾在北大執教半輩子，一九五二年全國教育大調整，他調任東北人民大學教授，兼文學教研室主任。工作繁重，生活條件差，病倒後，送進北京的協和醫院，已回天無術。一九八四年，蕭乾寫了《我的啓蒙老師楊振聲》，一九九八年在北京醫院病房裡，又懷着深情補寫了《我的恩師楊振聲》。

一九五六年是蕭乾在文字工作上的豐收年。刊在《人民日報》上的有《蕭伯納二三事》（隨筆）、《蕭伯納語錄》（譯文）、《餐車裡的美學》（隨筆）、《初冬過三峽》（散文）、《人民教師劉景昆》（特寫）。其中《萬里趕羊》在讀者中間引起的反響較大。報紙從而專門刊登了幾期讀者來信。文藝界更注意的是「本報特約記者」這一頭銜。

轉年，五月二十日的《文匯報》上刊出了蕭乾的《「人民」的出版社爲什麼變成了衙門？》。我姐姐和母親讓我轉告蕭乾，勸他少寫爲妙。她們沒訂報，是我那個在新華社工作的弟弟學樸告訴她們的。我回到東總布胡同宿舍，鄭重地對蕭乾說：「我家裡的三個人都在爲你提心吊膽。」蕭乾立即打電話給《人民日報》，要求把剛送去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抽回來。然而，最終他還是被《人民日報》總編輯鄧拓說服，聽任此文見報。

就是這位原本「書生」氣十足的鄧拓。於「山雨欲來風滿樓」的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八日凌晨，親手果斷地結束了自己五十四歲的生命。

進入新時期，我於一九八五年六月赴日，以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研究員的身份在東京東洋大學從事爲期一年的日本近現代文學研究工作。我寫了一篇《東洋大學巡禮》，由蕭乾轉給《人民日報》，刊於九月十七日的版面上。校方很重視此事，請人譯成日文，發表在《東洋大學校友會報》（一九八六年，總第一四七號）上。儘管改革開放以來各種新報刊如雨後春筍般湧現，在日本人心目中最有權威的仍是《人民日報》。

蕭乾與《人民日報》的緣分延續到最後住院的日日夜夜。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五日，他寫了一篇《抗老哲學——給自己做點思想工作》，刊於《人民日報》（四月三日），獲「成小杯」徵文一等獎。一九九七年十二月十二日，還寫了篇短篇小說《「法學博士」》，也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他在致巴金的信（十二月十四日）中，提及此事：「前天，我忽然寫了篇二千多字的小說，這是幾十年來沒有的事。——已給了《人民日報》。也許還能來個回光返照，再接再厲，湊成一本。」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八日，蕭乾文學館在內蒙古大學揭牌，我專程從北京趕到呼和浩特市，出席了揭牌儀式（見《光明日報》，四月十九日）。我送去的蕭乾遺物中，有《人民日報》記者林鋼的夫人顧世芬女士做的一雙棉拖鞋。這不同於花錢買的，是林夫人一針針納的。林鋼還經常贈送夫人自己種的倭瓜。他們知道，蕭乾的腎功能減退，需要食補。暮年，蕭乾時常念叨在柏各莊農場關心過他的朋友們。其中就有《人民日報》的季音、林鋼、藍翎。蕭乾去世後，我經常爲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續文緣。蕭乾在《未帶地圖的旅人》中談到一位電影專家曾在鑒定會上斷言他「這個人遲早必然會叛逃到倫敦或紐約」。說這話的是鍾惦斐。不用說叛逃了，就連通過合法手續移居海外，蕭乾和我也不幹。因爲我們的事業在祖國，我們心繫生於斯、長於斯的故土。

長壽的奧秘

言止善

長壽的奧秘，我知道一點點。

一百零三歲的學者周有光，作客央視的《小崔說事》。主持人崔永元請他談談長壽的奧秘，他笑瞇瞇地回答：「這個問題，你該去問醫生呀。」周有光長壽，當然是有經驗的，他笑而不答，實際上也做了回答，那就是——醫生的話，總該聽聽吧。

研究楚辭很有心得的學者文懷沙，也是一位世紀老人。他生命中有不少傳奇，九死一生的事就發生過多次，記錄下來眞比小說還精彩。有一回，他聽廣播，電台播完他的作品後評論道「文老在世時」云云。他聽到後，不但不生氣，反而很高興。他認爲他死去後知音還在，所以很欣慰。由此，我想，長壽是和知音有關係的。

被譽爲「世紀的先知」的英國思想家羅素，享年九十八歲。他認爲他的長壽與他的家族的遺傳基因有關。此外，他自認爲保持了健康的生活方式，就是從來不忌諱什麼食品，犯睏了就去睡覺。他在八十九歲的時候，還去參加反核遊行，不曉得觸犯了當局的哪一條，被迫坐了一個禮拜的班房。他不知疲倦地參加社會活動，正是這些活動強化了他的生命力。

一九八一年四月三日，世界衛生組織公布了世界有三大長壽地區，分別是巴基斯坦的勞扎，蘇聯的高加索和厄瓜多爾的畢路卡邦巴。這些地區的人平均壽命長，尤其是百歲老人的比例，竟比世界其他地區高出八到十二倍。

這份材料一公布，美國的大出版商，紐約洛蘭德出版公司的老闆薩拉・何塞敏感地嗅到商機。當即，他決定出版一套探索長壽地區奧秘的叢書，因此立刻派出六名記者，赴三地採訪。

與此同時，何塞又緊鑼密鼓地在全美各大媒體打出廣告，信誓旦旦地向世人承諾在三周內推出這套百歲長壽探秘叢書。市場很快有了反饋，短短幾天內，公司就迅速收到全國各地的六百五十萬套叢書訂單。

但事情的發展並非如何塞所料。因爲時間太緊，記者沒能按原計劃時間完成書稿，何塞卻不得不按照協議，向預訂商支付高額的違約金。最後，極度焦慮的何塞崩潰了——他突發腦溢血，撒手人寰，年僅五十二歲。不久，那套介紹長壽奧秘的從書出版了，十分暢銷。我沒有讀過那套書，卻知道了一條關於長壽的奧秘，就是，不要像何塞那樣生活。

魚頭

青絲

民間有諺云：「魚頭三錢參。」意爲魚頭的營養價值很高，一個魚頭足抵三錢人參。只不過，這話更像是常吃魚頭的底層百姓的自我抬舉。畢竟，在肥馬輕裘的豪門大戶眼裡，寡肉多骨的魚頭就是麻煩的代名詞，是根本上不了枱面的低賤之物。北宋時，參知政事魯宗道因爲個性耿直，嫉惡敢言，貴戚對他又怕又恨。由於繁體的「魯」字上面是個「魚」字，加上魯宗道爲人又是直言耿介，所以有人爲他取了個外號叫「魚頭參政」。這個外號含魚頭有麻煩、遭人厭的意思。《紅樓夢》裡，王熙鳳說：「我反弄了個魚頭來拆。」從她的話裡所透示出來的，也是對魚頭的深深鄙夷。

不過也有人相信，魚頭有補腦、治療偏頭痛的功能，故而酷嗜此物者也着實不少。《南史》中記載，梁武帝的兄弟，臨川靖惠王蕭宏非常喜歡吃魚頭，「常日進三百」。蕭宏吃的是鯽魚頭，屬於是魚頭中的下品，如若不從食補的方面考慮，很難理解他的這種吃法究竟有何意義。而如今，酒樓食肆裡的天麻燉魚頭，也是一道被冠以補腦噱頭的食療名菜。

其實就味道而言，魚頭的美味程度與肉多肉少關係不大。魚頭比較常見、且又便於操作的吃法，是把魚頭一剖兩半，用薑酒醃漬去腥，然後混同大塊豆腐、幾截青蒜，一同放入水中熬煮。待到湯色微微泛白，魚頭中的膠質被徹底熬出，在湯裡灑放少許的白胡椒粉，喝起來鮮甜暖辣，味道很美。或者以之作爲火鍋的湯底，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時候，魚頭食與不食，已不是很重要，即使棄之，也不可惜，人們索取的只是魚頭湯的爽滑鮮美而已。

能吃辣、口味重的人，對於湘菜中的剁椒魚頭評價都頗高。而對於湖南人來說，剁椒又幾乎是每家必備。每年辣椒上市的時候，選取個頭細長的紅辣椒剁碎，用海鹽、烈酒醃漬，數天即成。做剁椒魚頭，要用鱭魚，也就是俗稱的大頭魚。將洗淨的魚頭剖爲兩半，經過薑酒醃漬，置放碟中，下面鋪放一層薑絲，然後在魚頭上面鋪滿剁椒，入鍋蒸至入味。起鍋後，把香蔥、芫荽均勻地灑放在魚頭上，用橄欖油或茶油燒熱，澆在上面即可。剁椒的口感生脆，又鹹又辣，經過蒸汽的催逼，味道全滲入到了魚頭當中。用於下飯，毫不誇張地說，飯也要比平時扒得大口些。

當然也不能忘了砂鍋魚頭。把魚頭用油煎黃，佐以豆腐、筍絲、冬菇絲、胡蘿蔔，盛放在小砂煲中，以小火煨燜。在「咕嘟」的翻滾聲中，砂煲中的湯色漸漸乳白，豆腐也成爲了蜂窩狀，此時將香蔥粒撒入拌勻。魚頭香滑，豆腐溫軟，口感妙不可言。尤其是在寒風凜冽的冬日，燜一鍋白米飯，煲一份砂鍋魚頭，熨貼溫暖的不僅是人的轆轤飢腸，還牽扯着遊子歸家的心。

毛澤東游湘江逸事

唐傑修口述　巴　陵整理

毛澤東的《水調歌頭・游泳》裡的「才飲長沙水，又食武昌魚」成爲名句後，很多歷史學家都關注起毛澤東游湘江之事。毛澤東老年游湘江有兩次，一次是一九五六年五月三十日，一次是一九五七年中秋節，這裡所講的是一九五六年的事。

五月三十日，正好是雨過天晴，湘江水暴漲，波濤澎湃，黃澄澄的江水拍打着江岸，江邊樹木很多被淹沒。

毛澤東那天坐軍用飛機到達大托機場，沒有休息，沒有用早飯，直奔湘江邊。毛澤東從大托機場出來，穿過豹子嶺，走黑石舖，準備上解放垸河堤下湘江。

幾天前，長沙及湘江上游下大雨，黑石舖路上的泥水還沒乾。時值上午十點左右，黑石舖通往解放垸的馬路開始戒嚴，行人車輛被攔在幾十米之外，路面也鋪好了稻草。沒多久，從東面開來幾輛小轎車，第一個下車的人身穿灰色中山裝，身材魁梧、體型較胖、滿臉和悅，這就是毛澤東主席。毛澤東身後跟着一位身着青衣裙，高瘦的女人，她是江青，兩人往湘江邊走去。

車正好停在離唐傑修家門口五十米處，毛澤東往前沒走多遠，拐進路邊的唐家。唐家的男丁早已出工，只有唐傑修的嬸娘冀淑雲在家。

人與事

冀淑雲見來了客人，非常客氣的迎上前去，毛澤東伸右手與冀淑雲握手，並問好。冀淑雲只知道站在她面前的人好面熟，又叫不出名字，正想問時，望見堂屋神龕上掛的毛主席像，非常神似。冀淑雲馬上反映過來，客人是毛主席，高呼毛主席萬歲！毛澤東馬上擺手示意冀淑雲不要喊叫，並問冀淑雲的家庭情況，問了家中有多少口人，哪些親人在世，日子過得咋樣，冀淑雲一一作了回答。當得知冀淑雲的侄兒唐傑修是大托鄉的鄉長，毛澤東非常高興，笑着說：我們是來到了鄉長家啊！

冀淑雲又馬上說：要不要叫我侄子唐傑修回來向主席彙報情況。

毛澤東說：不必要了，我們馬上要走，叫你侄兒好好爲人民服務，爭當人民勤務員。冀淑雲忙給毛澤東、江青倒茶、搬櫈子，毛婉言謝絕，想抽身離去。毛澤東看到房子是土磚構築，房頂蓋着茅草，又對冀淑雲說：大娘，現在條件艱苦點，以後日子會一天天好起來的。

毛澤東離開唐家，逕直走向解放垸。當時湖南省委書記周小舟安排毛澤東在猴子石江邊的客船上用午餐，船上只帶了半桶自來水，很快就喝光了，炊事員從江中提水燒給毛澤東喝。毛澤東喝着故鄉的水，說：湘江的水眞好！詩句中的「長沙水」就是湘江水。

毛澤東在猴子石下水，當時江邊的水質比較差，隨從人員派船把毛澤東送到深水區。看到江水洶湧，警衛人員和陪游的湖南省游泳運動員心裡都有些發怵，勸毛澤東別游了，毛澤東卻很興奮，說：水越深，浮力越大，游起來就更便利嘛！一個猛子撲入江中。毛澤東游出水面，毫不在意湘江水的兇狠，照直向江中游去。眼看被捲過去來的一棵大樹樁撞着，警衛人員急得撲過來阻擋，毛澤東迅即抓住樹樁，當救生品。一小時後，毛澤東靠向橘子洲頭，上岸後在一位周姓農民家門前長櫈上一直坐到日落西山。